

景观歌剧凝聚中意两国艺术家创意和心血

北外滩《茶花女》惊艳亮相

■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当耳畔传来雷声阵阵,继而跟进淅沥雨声时,面对浦江夜景等候北外滩景观歌剧《茶花女》彩排开场的观众,忍不住一边抬头看天,一边懊恼怎么没带伞!此时,音乐家许忠举着话筒说:“试音结束,演出马上开始……”原来是剧中的雨声!昨晚,当从各地赶来的观众静候在国际客运码头,怀着期待就要被雨水浇灭的沮丧心情时,忽而听到“试音”二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恍悟“音响老好呢”。这台凝聚着中意两国艺术家创意和心血,且以陆家嘴夜景为“天幕”的露天演出,也是为2015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预热的第一场“艺术天空”活动。

浦江夜景为“天幕”

“景观歌剧”虽然并不是在上海第一次上演,但是以浦江夜景为“天幕”的创举,尚属首次。舞台就贴着黄浦江建,长圆形。因为长过

30米,每次演员们从两侧分头登台,都要跑步前进。跑步前,还要登上好几级台阶。乐池,则如同剧场内演出一样,“埋”在观众席与舞台之间。坐在层层加高的观众席最后一排大约第20排的位置,也看不到乐手的头顶。

“酒杯”暗示茶花女

值得称赞的是歌剧《茶花女》的舞美。正如意大利导演马可·卡蒂尼承诺的,剧组在相对空旷的客运码头舞台上,造出了7个细脚伶仃,但是肚子不小、个头接近10米高的香槟酒杯。卡蒂尼曾表示,景观歌剧的舞美,必须与景观——也就是陆家嘴夜景和波光粼粼的浦江交相辉映。因而,舞美必须“透”,不能有“墙”,否则挡住了光和景。他觉得“玻璃”这个元素,既是陆家嘴的主体视觉,也是茶花女“强而脆”的命运象征。该剧开场,正是一场聚会,众人高歌《饮酒歌》,故而香槟酒杯的意象也很符合情境。只是,出于岸边防风的安全考虑,这些如柱般的“酒杯”没有做成透明玻璃状,而呈白色,可供投影。烛火在“酒杯”上若

隐若现,同样暗示着茶花女,不过也只是可以燃烧的一小簇火,有一点光。

收获意外“场面”

严格说来,看景观歌剧,看的是场面。再绝色的意大利美女高音登台,也是只能辨清她的发色。而舞台两侧大屏幕,只供打中文字幕用。大色块,也是景观歌剧的舞美常态。凡是女性角色登场,都身着各种艳色。舞台中间还有一个“圆台面”,便于人物在表现冲突时“跳上跳下”,体现关系的变化。场面,还会因为浦江上往来的船只而产生“动感”。一会儿,霓虹勾勒的游览船缓缓驶过;一会儿,未经装饰、黑黢黢的运输船开来,也成为看景观歌剧时的意外收获。

耳朵留给歌声与音乐

美景虽然令人偶尔分心,但是耳朵终究是留给歌声与音乐的。来自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乐队首席丹尼尔·帕斯克乐蒂,以及佛罗伦萨五月歌剧院乐团首席多明尼克·皮尔日尼

演出快讯

今晚,在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等上海最为“高大上”的标志性组成的天际线之前,景观歌剧《茶花女》正式首演。16、17日,还将上演世界经典歌剧序曲专场音乐会和中外歌剧咏叹调精粹音乐会。

率领的
上海国际

青年管弦乐团,带来最为和谐动人的伴奏。而来自意大利著名歌剧院和上海歌剧院的男女主角,各自都有着或冲破云霄或哀婉心碎的歌声展现。现场音效不比剧场内的效果差。唯一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江边,阴冷,背后小风飕飕,需要坚持2个多小时…… 首席记者 朱光



■ 格非来沪
谈创作
杜湘涛 摄

“我写完一个长篇以后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把初稿丢掉。如果把长篇写完了,初稿稿件丢了,我恐怕会自杀,这个恐惧是很大的。一个作家在构思作品以后东西都在脑子里,这个想法是100%错误的。”昨天,新科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来到上海思南读书会,他告诉在场的读者何为写作最好的状态:“要感觉文字在燃烧,这个时候你的脑子是白热化的,文字出来你是感觉不到的。第二天不看自

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来沪谈创作

写作最好的状态是文字在燃烧

己写的文字,就不知道第一天在写什么。”

《江南三部曲》的构思极其痛苦

《江南三部曲》令格非获得茅盾文学奖,但他也说,花17、18年构思这系列小说,“极其痛苦”。这痛苦是什么?格非举例,第二部是在十年前就构思完的,但当他把第一部写完以后,第二部必须要重新构思,因为时代变了。“写到第三部《春尽江南》最困难,写到这里必须和前两部有关系,但我很多的想法已经变了,不断跟自己去弥补这样一种裂痕,要说服自己,不断去妥协,跟各种各样东西妥协、协调,这很痛苦。所以写三部曲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主意。”

格非在清华教书,没有特例可以少上课,每年只有6月初到11月初可以完整写作。“焦虑之中最愉快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在宣布自己要写作的这四五个月,我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只留一个座机,只有两个人知道我,这个号,我就在这样非常安静的环境里面工作,所以想想还是非常愉快。”

文学应当关注那些倒霉的人

某次格非参加讲座,正好有读者带了《山河入梦》,请他朗诵,“朗诵了之后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完全克制不住。”三部曲里,格非自己最喜欢的,正是第二部《山河入梦》。因为在这部小说里,“我写出了到今天都很难忘怀的一位女性,这个人叫姚佩佩。”格非解释,姚佩佩是他最用心投入感情的人物,“这也是一个被社会梳理掉的很可怜的孩子,就跟林黛玉一样,看到外面的世界像刀剑一样,想躲起来。”卡夫卡的写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选择那些成功的人,格非亦赞同,“文学的功能就是关注那些倒霉的人、那些心灵挣扎的人、那些看不到希望的人,他们有很好的、高尚的情怀。”

年轻人的勇气是不断开拓

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这是文学圈里非常要好的一帮朋友,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头衔:先锋作家。这批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的青年如今都已成大家,但格非自述去年一桩尴尬事,有个记者来采访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再也写不出《褐色鸟群》(发表于1988年)那样的作品?当时

格非就愣住了,而第二次这个记者又来采访他,他的气已经消掉了,便告诉她,“我没有办法把自己这个50岁的人再变到你那个年龄去写《褐色鸟群》”。

所以,关于先锋文学的概念,格非想说的是,“我希望年轻人像年轻人,不要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多的文法,年轻人最大的勇气是要不断地去开拓,把那些既定的权威打掉,想想当年张艺谋和陈凯歌是怎么出来的?就是电影学院里面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孩,他就觉得要开一个电影的先锋历史,把这些老人全部干掉,你去问问张艺谋、陈凯歌,他有什么?如果把这些东西丢掉了,年轻的东西丢掉了,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虽然在创作上鼓励年轻人不断开拓,但格非也表示,一个专业作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格非给出的理由是,一个创作者必须有生活,必须有喜怒哀乐,必须有过不去的关口,必须有各种的折磨,虽然对写作来说观察有时候很重要,但是仅仅依靠观察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真相,要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必须把自己扎进去。“我自己做了一辈子的业余作家,你问我,我一定会告诉你,还是做业余作家比较好。”

本报记者 夏琦